

---

# 抗战前期国共两党 共建一个“大党”的谈判

习五一

---

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毅然捐弃前嫌,共赴国难,联合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在抗战前期,国共两党为寻求第二次合作的方式,进行了艰难曲折的谈判。国民党试图“消融”共产党,而共产党也试图“改造”国民党。意识形态歧异的两党,一度令人惊异地试图共建一个“大党”。1937年至1939年,两党相继提出各种组织结盟的方案,终因立场差异巨大,沟壑难填,谈判未能达成协议。

然而,这毕竟是国共两党关系史上重要的一页。由此形成的国共合作,长达10年。国共联合抗日,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

##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事变,将侵略魔爪伸向中原纵深区域。为抵御日本妄图吞并全中国的侵略意图,国民政府开始与苏联秘密交涉。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希望通过共产国际,寻求联共抗日的政治途径。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将国共两党的秘密接触,推向正式谈判。

1937年,国共两党信使往返,折冲樽俎,终于达成妥协。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公开提出实现国共合作的条件。与此同时,国共双方派出代表,在西安举行谈判。

24日,周恩来将其拟定的谈判方针电告中共中央,立即获准执行。其中有关政党的原则为:一、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二、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惟国民党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的党(蒋在西安有改组党的发轫),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sup>①</sup>这是中共领袖第二次设想将国民党改组为两党的革命联盟。鉴于历史经验,在两党寻求联盟时,坚持独立性是共产党的基本方针。然而,再次实现国共两党合作的首要难题是军事。西安谈判双方围绕改编红军等议题,争执激烈,进展甚微。中共中央提出“见蒋解决”。

3月下旬,周恩来飞抵杭州,同蒋直接会谈。周声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立场,“系站在为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他阐述了关于边区行政完整、红军自主改编等项具体要求。蒋介石表示,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使)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局面”,但他要求两党彼此“检讨过去”。蒋介石明确提出,中共“不必说同国民党合作,只是与他合作”。他希望双方“永久合作”,“即使他死后也要不生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周恩来回答说:“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一个好办法。”蒋介石当即提议,由中共先行拟订共同纲领草案。<sup>②</sup>

周恩来与蒋介石相识多年,对其滔滔言辞背后的真实意图一清二楚。他在中共致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总观蒋的谈话意图,中心在领袖问题。”蒋介石一向主张,政党建设的首要议题应为树

---

① 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致张闻天、毛泽东》(1937年2月24日),《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页。

② 《中央关于同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37年4月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9—182页。

立领袖的绝对权威,在列强凌逼的民族危机中,只有领袖独裁制,才能凝聚起复兴民族的强大力量。<sup>①</sup>

4月初,周恩来返抵延安。中共中央立刻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领袖们经反复磋商,决定关于国共两党再次联盟的基本原则为:一、可以推举蒋介石为领袖,但其权力必须受共同纲领的制约;二、可以加入联盟性质的政党,但必须保持整体的独立性,允许自由退盟,保留独树一帜的权力。

6月初,周恩来抵达庐山,继续与蒋介石洽谈,将中共中央拟订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提交会议磋商。该草案的宗旨为: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权,保障人民自由;实现民生幸福,建立国防经济等,细则共52条。这些原则没有涉及蒋介石提出的领袖独裁权。

对此,蒋介石颇为不满。他一改杭州时的宽和态度,强硬地表示红军改编后,不能设立总部,并明确提出“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对边区“实行编遣,其领袖须离开”。针对中共提出的成立民族统一联盟的建议,蒋介石提出“彻底合作”的建议:

一、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二、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三、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四、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党关系,并由此坚固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间的联合。<sup>②</sup>

显然,这个方案意在将共产党逐步溶化于国民党之中。周恩来当即表示:有关组建国民革命同盟会的建议,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有关取消红军统一指挥权等项,难以接受。双方争持不

---

① 《中央关于同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37年4月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9—182页。

② 《中央关于同蒋介石第二次谈判情况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37年6月17日),同上,第265—266页。

下,谈判未能取得结果。

6月中旬,周恩来返回延安。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方案再三推敲,鉴于抗战形势日趋严重,决定作出必要让步。新的方案仍坚持红军改编后必须保持独立统一的指挥权,但对于政党合作的方针修正如下:

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之政治基础。同盟会组织原则,在承认纲领的基础上,可同意国共两方各推出同数干部组织最高会议,另以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sup>①</sup>

就在国共两党谈判举步艰难之时,卢沟桥畔响起抗战的枪声。抗日战争的爆发给国共再次结盟注入了新的活力。

7月14日,周恩来等应邀前往庐山。起初,谈判仍十分艰难。中共接受两党组建同盟会的建议,并未化解双方在军事指挥权上的争议,蒋介石甚至提出完全取消中共军权。双方锱铢必较,毫不让步,谈判陷入僵局。20日,洛甫、毛泽东致电中共代表指示:“日军进攻之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定)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sup>②</sup>周恩来等随即离开庐山。

果然,时局进一步恶化,给国共谈判带来决定性的转机。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规模进攻上海,战火在国民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燃起。蒋介石意识到,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已在劫难逃,红军开赴前线已迫在眉睫。18日,他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僵持已久的红军改编和指挥权问题终于解决。9月22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翌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

① 周恩来:《中央书记处关于与蒋介石谈判情况给国际书记处的报告》,1937年6月25日,手稿。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362页。

②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转林伯渠电》(1937年7月20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第19页。

## 两党关系委员会的合作与分歧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较为融洽。国共联合组成两党关系委员会,继续探寻合作的方式。共产党努力争取签署共同的政治纲领,而国民党则意在推动两党从组织上“融为一体”。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与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大力推动密切相关。1937年11月底,中共高级干部王明等人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关于“抗战高于一切”的指示十分重视。12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统一战线的方针。与会者认为,有必要再向国民党作出某些让步,争取尽快取得两党之间真正的谅解与合作。会议决定,今后国共合作的方针为“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

蒋介石也对共产国际寄予厚望。他迫切希望获得苏联的直接援助,以抗击日本的侵略,因此,他对与共产国际有特殊关系的王明格外重视。12月上旬,蒋接连发出邀请,请王明赴武汉举行会谈。18日,王明、周恩来等应邀抵汉。20日,蒋介石会晤中共代表。王明阐述了中共中央对抗战形势、两党关系、合作任务等方面的主张,并转达了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援助的具体措施。周恩来提议,为进一步密切两党合作,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商议共同纲领。蒋介石表示十分赞同,认为“外敌不足虑”,“只要内部团结,胜利定有把握”。<sup>①</sup>

12月26日,国共两党正式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国民党代表为陈立夫、刘健群、张冲、康泽;共产党代表为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会议决定,每5天会商两次,并推举周恩来和刘健群联合起草共同纲领。但实际上,共同纲领草案是由周恩来等执笔完成

---

<sup>①</sup> 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致洛甫、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37年12月21日。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89—1949),第394页。

的。30日,共产党代表将纲领草案提交两党委员会讨论。但国民党代表将草案束之高阁,转而要求中共促成苏联出兵援华。双方未能取得一致,共同纲领草案被搁浅。

国共双方签署共同的政治纲领是中共领袖孜孜以求的目标。国共公开宣布再次合作之后,毛泽东明确指出:

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的纲领。共同纲领是这个统一战线的行动方针,同时也就是这个统一战线的一种约束,它像一条绳索,把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一切加入统一战线的团体和个人都紧紧地约束起来。这才能说得上坚固的团结。我们反对旧的那一套约束,因为它不适应于民族革命战争。我们欢迎建立一套新的约束代替旧的,这就是颁布共同纲领,建立革命秩序。必须如此,才能适应抗日战争。<sup>①</sup>

中共领袖再三呼吁制定共同纲领,意在推动国民党的政治改革。为实现全民族抗战,共产党主动停止了推翻国民政府的军事斗争,但没有放弃改革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的政治意图。中共中央希望,通过各党派(主要是国民党)的民主协商,制订共同遵守的政治纲领,“代替国民党的统制政策”。<sup>②</sup>而国民党领袖则认为,抵御外侮,复兴民族,应实行“党国集中统一”<sup>③</sup>,统一政令、军令,强化国民党的领导,形成“绝对的统一政治权”。<sup>④</sup>这实际上是继续一党执政,将一切异己党派统一于国民党的旗帜下,从而强化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

舆论往往是行动的先导。1938年初,国民党主办的《扫荡报》、《武汉日报》等报刊,发动笔墨攻势,宣传“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2月6日,《扫荡报》刊登文章声称:“在共同信仰三民主

---

① 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37—338页。

② 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1937年9月29日)。

③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宣言》(1936年7月14日),《中央党务月刊》第96期。

④ 林森:《第五届第二次中央全会开幕词》(1936年7月10日),同上。

义之下,就不应该有‘国共合作’的名词。”<sup>①</sup>次日,该报社论公然指责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封建割据”,“必须一律将其取消”,声称:“欲使国家趋于绝对统一之途,必须一党专政”,“如有反对一党专政者,即无异于破坏抗日”。<sup>②</sup>

与此同时,高层政治加紧策动。1月23日,在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会议上,国民党代表刘健群等宣传“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主张。蒋介石认为,两党合并问题应尽快解决。他指派邵力子与周恩来秘密磋商。周恩来表示:“如同意于此项办法,必致内部流血,且于国民党方(面)无益处,故此事势难实现。”<sup>③</sup>

采取何种方式协调两党合作关系的议题,已经提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日程。

## 一个“大党”方案的提出

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问题,已经成为国共两党关注的焦点。国共最高领导人相继提出各自的主张。

针对国民党掀起的一党专政的宣传浪潮,中共代表团决定,以发表毛泽东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谈话的形式,将共产党的立场公之于众。2月9日,《新华日报》刊登的这篇谈话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决不放弃政治信仰和独立的组织原则,并指出: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互相合作,则国家统一,革命发展;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互相对立,互相否定,则国家分裂,革命困难。所以任何违反这种事实的意见,必然都是不能实现的——设或不幸而实现了,定造成国家民族新的灾难。<sup>④</sup>

---

① 茹春浦:《一个主义、一个信仰、一个最高统帅》,《扫荡报》1938年2月6日。

② 社论《强固统一》,《扫荡报》1938年2月7日。

③ 《汪世杰日记》手稿影印本,第1册(1933—1938),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176页。

④ 《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新华日报》1938年2月9日。

这篇谈话稿立即引起国民党最高领导的重视。2月10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时表示:对主义的信仰并不准备加以限制;他尤其相信孙中山所说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并不矛盾;对各党派也无意取消或不允许它们存在,唯愿“溶为一体”。比如共产党可以加入国民党成为一个派别,取消共产党组织,将来在国民党内最革命最能干的人就会成为国民党的基础。当然,国民党也可以改变名称,各党派都取消而加入为一派,总之党内是可以有派的。周恩来回答说: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两党之间的问题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蒋介石表示可以研究。随后,周恩来与陈立夫继续会谈。陈建议,在两党之外组织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国共两党共同加入。<sup>①</sup>显然,国民党已经具体设想组建一个大党,来解决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

针对蒋介石提出国共共建一个“大党”的建议,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解决两党关系的办法。中共领袖们指出:

只允许一党合法存在,同时不承认其他党派合法并存的办法,既为事实所不许,取消现存一切党派而合并为一党组织的办法,亦为事实所不能。解决此问题的唯一正确办法,在于遵照中山先生的精神,建立一种包括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即由各党派团体拟定一统一战线纲领,作为各方宣传共同遵守的方针;同时,由各方代表组成一由上而下的(即中央与地方的)统一战线组织,以规划抗日救国的大计和调整各党派各团体的关系;而参加此联盟之各党派,仍保存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sup>②</sup>

中共中央提议建立民族革命联盟,以此协调两党合作关系。此种设想与国民党共建一个大党的建议,显然有原则性的差异。共产

---

① 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毛泽东、洛甫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并转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8年2月10日,参见杨奎松著:《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394页。

②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1938年3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第486页。



党坚持保留自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正是国民党千方百计设法“消溶”的。中共中央的方案,于3月24日正式向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

共产党坚持在统一战线中保留独立自主权,使国民党高层领导深感忧虑。他们一致认为,国内政治“以共产党之处置为极大难题”。<sup>①</sup>国民党决定于3月29日—4月1日,在武汉召开全国临时代表大会,会议中心议题为国共两党“合并”问题。<sup>②</sup>

国民党领导人收到中共中央的信函后,并没有放弃“消溶”一切异己党派的设想。蒋介石一面仍主张对共产党“采取宽容态度”,一面在全会上强调:“本党是创造民国领导革命的唯一大党”,“如果本党今后能日趋健全,日益充实,负得起革命建国的责任,不仅共产党尊重本党,服从领导,国内现在一切党派,都必然消溶于三民主义之下,共同为完成国民革命而努力。”<sup>③</sup>

在“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方针的指导下,国民党迟迟不肯与共产党联合签署共同纲领。在此次会议上,它单独颁布了《抗战建国纲领》。该纲领包括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教育等项,共32条,与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相比,主要宗旨相同。中共中央认为,应该“坚决赞助其实现”,“在实施中发展与提高它”。<sup>④</sup>

为贯彻实施《抗战建国纲领》,国民党中央认为,必须强化党的领导。其组织措施主要是“确立领袖制度”和“设立青年团”。

国民党的独裁领袖制,自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即形消神散。北伐战争后,掌握国民党主要军事力量的蒋介石权势日隆。此次会

---

① 任世杰日记手稿影印本,第1册(1933—1938),第197页。

② 任世杰日记手稿影印本,第1册(1933—1938),第203页。

③ 蒋介石:《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1938年4月1日),《蒋总统集》第1卷,(台)中华大典编印会,1960年10月出版,第1037页。

④ 《中央书记处关于国民党临全大会后的策略问题致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1938年4月2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第508—509页。

议决定推举蒋介石任总裁,并授权其统一党政军指挥大权。其后数十年内,蒋介石在政治舞台上,行政职务曾有波动起伏,但党内总裁一职,终身未变。

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始见于1932年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上孙科等人的提案。此次大会宣布正式组建三青团。会后,国民党向共产党等政党提出共同参加组织三青团的工作。中共中央表示“准备赞成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试图使它“实质上成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青年的民族联盟”,以此“改造国民党”。<sup>①</sup>

6月9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时提议,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为统一战线组织,以此统一全国青年运动。蒋介石表示:“国共两党可以共同训练”,但“各党派不能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内活动”。<sup>②</sup>16日,国民党中央公布三青团团章,规定凡加入者不得参加任何党派活动。显然,国民党希望,全国青年不分党派,“溶为一体”,使三青团成为一党专政的先导。鉴于这种原因,中共代表团认为应暂观其发展变化。

国民党在武汉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后,一面继续实行联苏联共,抗击日本侵略的方针,一面采取种种措施遏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国共两党摩擦不断,全国各地不断发生摧残共产党人的事件。双方关于边区的谈判也争论激烈,毫无进展。

为进一步研究确定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与策略,中共于9月29日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全会确立了毛泽东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并详细讨论了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共中央认为:“一党主义都是没有根据的”,“违背一致团结抗日建国的大目标,有百害而无一利”,“更不利于

---

① 毛、朱、康、陈、刘致陈、周、博、凯电,1938年5月12日。

②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年),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398页。

长期合作”。<sup>①</sup>毛泽东所作的报告指出,国共“长期合作”,可能有三种组织形式:

第一种,“国民党本身转变为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又保存其独立性”。中共中央认为,“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好的一种组织形式,有利于抗日建国”。如果国民党赞同这种方案,共产党准备实行比第一次国共合作更妥协的办法:其一,“所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都是公开的,将加入党员之名单提交国民党的领导机关”;其二,“不招收任何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其三,加入三青团的共产党员,依据同一原则,“不组秘密党团”。

第二种,“各党共同组织民族联盟,拥戴蒋介石先生作这个联盟的最高领袖,各党以平等形式互派代表组织中央以至地方的各级共同委员会,为着执行共同纲领处理共同事务而努力”。这一方案,中共代表曾多次向国民党提出建议,但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第三种,现行方式,即“没有成文,不要固定,遇事协商,解决两党有关之问题”。中共中央认为:“这种形式太不密切,许多问题不能恰当的及时的得到解决”,“对于长期合作是不利的”。<sup>②</sup>

显而易见,中共领袖真诚地希望密切两党合作关系,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为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没有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结束,便匆匆赶回武汉。

10月4日,周恩来面见蒋介石,转交毛泽东致蒋介石亲笔信函。信中有道:“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

---

① 毛泽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14日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第629—630页。

② 毛泽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14日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的报告)。

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sup>①</sup>在会谈中,周恩来详细阐述了中共六中全会对抗战和统一战线的意见。应蒋的要求,周恩来于8日提交了中共中央建议的书面说明。蒋介石十分重视中共中央的意见,决定召集中央常委会,“考虑共产党与国民党合并之方案”。<sup>②</sup>14日,蒋介石约周恩来谈话表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的问题”,“必须由国民党常委会讨论。”他自己认为,“三青团章程可改变,中共党员可加入”,待日后研究考虑实施。<sup>③</sup>此后,因战局危急,广东和武汉先后失守,两党会谈被迫中断。

从抗日战争爆发到1938年秋,日本侵略军疯狂升级战争规模,企图速战速决,实现其武力侵吞中国野心。面临亡国灭种的侵略战争,蒋介石以抗战领袖的姿态,出现在全国军民面前,对异己的政治力量,包括共产党在内,态度较为宽和。因此,中共中央认为:“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方针。”<sup>④</sup>

应当指出,这一时期蒋介石对与共产党合作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国民党迫切希望获取苏联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正如杨格分析的那样,从抗日战争爆发起,蒋介石一直对国际援助和调停中日战争寄予厚望。令国际政坛惊讶的是,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苏联,竟然成为国民政府第一个慷慨大方的朋友。尽管莫斯科与南京之间存在过10年的紧张关系,但两国政府对扼制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亚洲大陆的急剧扩张,有共同的需要。从1937年到1939年,苏联提供了大约1000架飞机和数千名飞行员、军事顾问以及大批大炮、弹药、汽油等军事物

---

① 《毛泽东致蒋介石函》(1938年9月29日),童小鹏主编:《第二次国共合作》影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② 伍世杰日记手稿影印本,第1册(1933—1938),第399—400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年),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422页。

④ 《关于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的指示》(1938年8月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第538页。

资。这笔军援总价值为 2.5 亿美元,以 3% 的低息成交,苏联的军援直到 1939 年 9 月欧洲爆发战争之后才减少。值得注意的是,抗战前期,尽管苏联与共产国际积极推动国共两党第二次结成统一战线,但苏联的援助从来没有直接提供给中国共产党。国民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指出:“莫斯科在激起中国与日本对立方面的兴趣,比它传播共产主义的兴趣还要大。”<sup>①</sup>

在抗战前期,苏联军事援助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美英等西方国家直到 1938 年 12 月才提供了少量信贷,而且由于担心恶化与日本的关系,美英特别禁止中国政府用此项贷款购买武器与军用物资。虽然 1940 年以后,西方国家的援助逐步增加,但直到 1941 年下半年,其提供的总援助才大致与苏联持平。<sup>②</sup> 因此,在抗战初期,特别是蒋介石对苏联战略意图的体察尚未十分清晰时,如何调整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其获取苏联军援的重要战略筹码。

尽管在抗战前期,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较为融洽,但在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等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双方谈判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随着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两党关系新的危机正在悄悄滋长。

## 一个“大党”方案的流产

武汉失守标志着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随着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和共产党力量的消长,中国政治格局发生重要变化。国共两党裂痕日益扩大,两党合并方案流产,国共合作走向低谷。

在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中,共产党从偏隅之地走向全国政治舞台。其武装力量的发展尤为迅猛,至 1938 年底,八路军已扩充到

---

① Young, Arthur N.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杨格:《中国与援助之手》(1937—1945),第 18—21、26、54、125—130 页。

② 同上引书,第 207 页。

约 16 万人,比抗战初期增加 5 倍。八路军挺进华北,新四军先遣队深入苏南,开创了敌后游击战争的新局面。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发展到十多个,拥有人口 5000 万以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已经成为敌后战场抗击日军的主力。

在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抗击下,日本侵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终于被遏制。侵华日军深深地陷入战争的泥淖,其人力、物力、财力的不足日益明显,只得实行“以战养战”的战略,利用中国占领区的资源继续其侵略战争。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对日本侵华战略的实施构成巨大威胁,这促使日本进一步调整对华政策,将战争的重心转向肃清占领区,同时加强政治攻势,分化瓦解中国的抗战力量。1938 年 11 月 3 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表示如果国民政府改变“容共抗日政策”,撤换以蒋介石为首的主战派,便可以成为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同路人。<sup>①</sup>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日本对华方针的变化,国民党高层领导也在酝酿调整政策。10 月下旬,蒋介石致电国民党中央常委,征询对时局方针的意见。孙科回电,坚决主战,并建议“接受共产党所提的意见,以加强团结”。汪精卫则主张停战言和,建议“设法请英、德出任调停”。<sup>②</sup>12 月初,汪精卫会见蒋介石,对吸收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主张,深表忧虑。面对众说纷纭的建议,蒋介石早已成竹在胸,他一面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号召坚持持久抗战、全面战争和争取主动的方针;一面利用正面战场相持的时机,积极推动抗日派力量统一到国民党的旗帜下。

12 月 6 日,蒋介石在桂林约见周恩来,答复中共中央的建议。他说:

共产党跨党,大家不赞成。共产党既信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并成一个组织,力量可以加倍发展。如果同意,在西安召开华北西北将

① (日)《日本政府声明》(1938 年 11 月 3 日),《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东京 1969 年版,第 401 页。

② 汪世杰日记手稿影印本,第 1 册(1933—1938),第 415—416、446 页。

领会议后,就约毛泽东面谈。如果共产党全体加入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sup>①</sup>

对于这个将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内的方案,周恩来当即表示否定,他指出:

共产党信三民主义,不仅因其为抗战的出路,且为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党员则必不都如此想,故国共终究是两党……跨党是为了取得信任,但我们也不强求,如认为时机未到,可以采取其他办法。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退出共产党,这不可能也做不到。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是失节、失信仰,于国民党也有害而无益。<sup>②</sup>

蒋介石听到周恩来的答复,大失所望,只得快快地表示,如果国共合并之事不可能实行,就不必约毛泽东面谈。

此次碰壁之后,蒋介石并未完全心灰意冷。12月12日,他在重庆又约见国民参政会的中共代表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继续洽谈。蒋介石表示:

共产党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sup>③</sup>

中共参政员分别解释,“一个组织办法做不到,如跨党办法做不到,则可采取我们提议的其他方式合作”。会谈持续了五六个小时,双方各抒己见,相持不下。蒋介石劝中共代表“去国民党作强有力的干部,为国家民族共同奋斗,不必要共产党”。他特别对吴玉章

---

①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年),第434页。

② 周恩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8年12月6日。

③ 《陈绍禹等关于一个大党问题与蒋介石谈判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38年12月1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1939—1940),第5—6页。

说：“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sup>①</sup>会谈不欢而散。当晚，蒋介石派张冲向中共代表解释说：“委员长他太直率，并非说不合并只要分裂，请不要误会。”<sup>②</sup>

以上谈判表明，即使在抗战危急的时刻，深谋远虑的国共两党政治家依然关注着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前途。如何实现国民党设计的抗战建国方案，蒋介石的谈话的确相当直率。蒋介石认为，国共两党应从合作走向合并，首先从组织上溶化异己力量，再渐次达到政治思想上的统一。因此，他多次提出“希望中国只有一个党”，再三建议“共产党成为国民党中的一个派别”，并说明：“只要意志统一，思想可以自由。”<sup>③</sup>这并非表示蒋介石愿意国民党内出现异己派别，只不过是减少两党合并的阻力。

就在蒋介石合并国共两党之举屡受挫折之际，国民党高层领导集团出现巨大裂痕。12月19日，国民党副总裁兼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一行私自飞往河内。22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引诱国民党内的投降派，提出“签订日华防共协定一事，实为调整日华邦交之急务”。<sup>④</sup>26日，蒋介石发表演讲，驳斥近卫声明，指出：“他不过是以共同防共的名义，首先控制我国的军事，进而控制我国的政治文化以至外交”，“而实在于借此名义以亡华”。<sup>⑤</sup>蒋介石严词表示，坚持抗战，绝不妥协。与此相反，29日，汪精卫发表致国民党中央及蒋介石的“艳电”，公然主张依据近卫声

---

① 吴玉章：《国民参政会上的一个重要插曲》，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重庆出版社1977年版，第471—472页。

② 《陈绍禹等关于一个大党问题与蒋介石谈判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38年12月1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1939—1940），第5—6页。

③ 任弼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1938年4月14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第25页。

④ （日）《日本政府声明》（1938年12月22日），《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第407页。

⑤ 蒋介石：《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202页。



明三原则,即: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进行“和平谈判”。<sup>①</sup>从此,汪精卫走上叛国投敌的道路。

关于汪精卫叛逃的思想动机,国民党部分上层人士认为,“系因中央不愿考虑议和,及本党有进一步容共之趋向”。<sup>②</sup>实际上,抗战爆发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放弃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中日战争。至于“进一步容共之趋向”,显然是指蒋介石将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的方案。汪精卫对此持有异议,他始终强调后一个因素。他一再声称:“我之离开重庆,十之八九是因为共产党人夹杂在里头。”<sup>③</sup>汪精卫与重庆国民政府决裂后,进一步指责蒋介石“违反全党公意,私行容共”。<sup>④</sup>反共成为汪精卫汉奸理论的重要基石。

汪精卫的叛逃似乎给国共两党进一步加强合作带来转机。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时局的指示认为,这一事件表明:“中国的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开始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部分动摇分子已经由亲日派转向汉奸集团,这是中国抗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大进步”。“这种进步必然推动国共合作的继续进步,但这并不会取消国民党历来限共防共的政策。”<sup>⑤</sup>

蒋介石也认为,汪精卫的叛逃,会给国共两党的联合注入新的向心力,他可以趁机推动两党合并方案的再次出台。1月20日,即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开幕的前一天,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又提统一两党事”,“并说汪走更是两党团结的好机会,即暂不统一也要有新办法”。<sup>⑥</sup>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一面明电祝贺国

---

① 汪精卫致国民党中央党部蒋介石等电(1938年12月29日),《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1940年版。

② 汪世杰日记手稿影印本,第1册(1933—1938),第435—454页。

③ 汪精卫:《欧战与中国前途》,《中华日报》1939年9月5日。

④ 汪精卫:《民主义之理论与实际》(1939年11月23日),见《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1940年版。

⑤ 《中央关于汪精卫出走后的时局》(1939年1月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1939—1940),第3页。

⑥ 《周恩来关于与蒋介石谈判情况及意见向中央的报告》(1939年1月2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1939—1940),第6—7页。

民党五中全会,表示愿加强两党合作;一面密电蒋介石,再次阐述两党不能合并的原则。中共中央密电指出:

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共产党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sup>①</sup>

中共中央明确表示绝不能接受国共两党合并的方案,意在“打断蒋此种念头”。<sup>②</sup>同时,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向国民党中央全会建议,“慎重考虑”中共六中全会提出的“保证两党长期合作办法”。<sup>③</sup>中共中央斩钉截铁地拒绝两党合并,立即引起国民党中央的强烈反响。

如何对待共产党,成为国民党五中全会的重要议题。一时间,反共情绪高涨。蒋介石向全会说明,目前正值全民族抗战时期,因此对共产党不宜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而应主要使用政治手段“严正、管束、教训、保育”。他特别指出:“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sup>④</sup>一年前,蒋介石在提出国共两党“溶为一体”时,曾表示准许主义信仰自由,愿意容纳共产党为国民党内的共产派。经过一年艰苦的谈判,蒋介石意识到,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坚持组织独立的思想基石,因此,取消共产主义旗帜,是实施国民党合并共产党方案的关键所在。

国民党五中全会宣告断然拒绝中共中央提出的跨党联盟的方案。根据全会精神,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于4月14日颁布《防制异党

---

① 《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1939年1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1939—1940),第17—18页。

② 《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1939年1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1939—1940),第17—18页。

③ 《中央关于拒绝所谓一个大党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39年1月2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1939—1940),第5页。

④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活动办法》的密令,同时专门设置“防共委员会”,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管束”共产党。

由此可以断定,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的转折点。共产党明确表示,拒绝两党合并方案;而国民党则郑重声明,拒绝国共跨党方案。此后,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继续以临时协商的方式维持,直至再度破裂。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毅然化敌为友,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执政的国民党凭借国家危机产生的民族凝聚力,力图将国共两党“溶为一体”,实现其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举措再三,终未能如愿。而弱小的共产党则主张民主协商,制定共同纲领,坚持各党派保持独立、长期合作的方针,终于在战争中发展壮大,成为全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一党专政给国家民族造成的灾难,已成为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而各党派互相合作长期共存,国家政治民主协商的原则,至今依然富有生命力。

(作者单位: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